

# 社会学的修辞

成伯清

**Abstract:** The rhetorical turn is one of recently intellectual movements of broad and significant scope that takes pla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the rhetoric of sociological inquiry.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sociology is not necessarily destructive, although it rejects the orthodoxy view of knowledge. In contrast to the logic of inquiry, it emphasizes the moments of persuasio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academic activity. By discussing questions such as commonsense, story-telling, quantophobia and the metaphor of diagnosis, the paper challenges some basic postulates in sociology and suggests an alternative image of sociological practice.

西方学术界在世纪之交的主要动向大致可用一系列的“转向”和“终结”来概括。其实,放长了视野看,肇始于康德的“认识论转向”曾经统治了哲学近两个世纪。在这个范式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形态的建构。迈入20世纪以后,转向的速度大大提高,其中之荦荦大端者,有“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后现代转向”、“文化转向”与“修辞学转向”等。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能力是前所未有的,任何转向所提供的探索空间,不用多久,就会触及界限,几乎耗尽所有的可能性;加之学术场域内部的竞争也空前激烈,“理论创新”俨然成为一种职业强迫症。于是,不时传来惊呼“终结”的喧嚣之声,虽然在“历史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哲学的终结”、“自然的终结”乃至“终结的终结”之后,学者们还在继续谈论着已被“终结”的话题。不过,“转向”、“终结”的交替出现、此起彼伏,也不全然遵循时尚的逻辑,至少,在转向之后,研究者和言说者心中多了一重想象的维度,或者,多了一层反思。

应该说,社会学共同体没有能够很好地应付语言学和解释学转向所提出的挑战(Henry, 1995),其后果是社会学在学术市场上成为知识的输入者,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影响越来越趋于萎缩。在主流从业者中,实证主义的模式依然根深蒂固(Mohan & Kinloch, 2000),尽管不同的声音时常出现,但并未撼动学术实践体制的根本(Peters, 1990)。更为致命的是,社会学似乎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弱,或者说,对现实的回馈越来越少,在公共领域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弱。所以,在质疑“社会学是否死了”(Pilkington, 1997),或者干脆宣告“社会学的解体”(Horowitz, 1993)的同时,也有人认为社会学出现了道德危机,即职业社会学者失去了对现代性的道德困境的关怀(Lemert, 1995)。

虽然在近20年,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反思”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中不难看出,以致于“反对反思”的主张也出现了(Lynch, 2000)。而反思之所以让人厌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反思多是在学科内部进行的,与“消除偏见根源的方法论努

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找到有力的外部参照点。而借助于跨学科来进行反思的,又多在邻近的具有类似假设前提的学科中寻找启发,未能将社会学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中。

当然,在一个不信任“元叙事”(利奥塔,1997)的时代,在一个将对“异质性”的推崇进行到底的时代,倘若声称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支点,那就真是不识时务了。所以,为显学术的“政治正确”,在受到“后现代”的指责之前,我们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本文不能也不想解决社会学中的根本问题,只是不愿继续纠缠于“方法论的恐怖”(methodological horrors)(Woolgar,1988),而是顺着修辞学的转向,尝试对社会学的故事进行一些新思考,或者换一种讲述的策略。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先来看看何为修辞学转向。为了说清修辞学转向,必须从修辞学内部的转向谈起。

## 修辞的认知性

修辞学,在其源头,是指“说服的技巧”或“演说的艺术”。修辞学的兴盛,显然同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同维护自身的权利大有关系。演说者多以“或然性”(probability)或“可信性”来打动人(高辛勇,1997)。但到了为西方哲学奠定基础的柏拉图的眼中,修辞作为一种讨好听众的工具,在道德上变得可疑了。这同柏拉图的精英哲学观不无关系。在他看来,群众的“意见”(doxa)是不可信任的,诉诸大众的演说,不过是用夸耀的辞藻令人耳眩目晕而已。当然,柏拉图也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哲学基础,那就是“修辞”与“辩证”的对立。“辩证”关心的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不是个人意见;而“修辞”所要诉诸的正是这种意见。为了防范花哨的言词对于真理的遮蔽,柏拉图甚至将诗人逐出理想国。

到了亚里斯多德手中,修辞学的地位稍有好转。他所撰写的《修辞学》,为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定下了基本的体系。亚里斯多德认为,“修辞学是与辩证学相似又相对的学科”(高辛勇,1997:127)。“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亚里斯多德,1991:24)。在阐明修辞学的精义上,亚里斯多德固然功不可没,但仅凭动机意图来区分,显然又留下了一个千古疑团。<sup>①</sup>后来沿着这条思路将修辞学薪火下传的西塞罗和昆提连,也非常强调优良的品德。尽管修辞学在基督教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际,也曾面临生存危机,好在圣奥古斯汀的主张——即修辞学尽管出身不正,但无碍其为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服务的功效——为修辞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于是,在中古世纪,修辞得与“文法”、“逻辑”鼎立,成为人文教育的基本学科。

修辞学真正被狭窄化和边缘化是17世纪左右的事。那时,科学正开始大行其道。洛克(John Locke)曾言:“如果我们要以事物本来的样子谈论它们,那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修辞艺术(除了条理和清晰)……都不过是暗示了错误的观念,煽动情感,从而误导判断;因而,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参见Simons,1990:1)。于是,修辞只能成为一种文学性的措词布局的艺术,同科学格格不入。可以说,古希腊人曾经因为害怕修辞的力量而排斥它,而科学主义者则因蔑视而排斥它。

科学之排斥修辞,是因为相信科学真理是纯粹客观的,同表达真理的语言毫无关系。语言

<sup>①</sup>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修辞传统,但在修辞与道德的问题上,首先出现“修辞”一词的《易传》中的“修辞以立其诚”倒是非常漂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若按后现代式的解读,这也是一语道破天机!无论是对修辞还是道德。另外,汉语中对于修辞的理解,请参见周振甫(1999)。

也被认为是透明的、纯粹的传达工具。任何对于修辞的注重,都可能“以辞害意”,扭曲真理。而在这种观念的背后,又暗含着科学家对于科学的垄断。科学真理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的,是用事实来说话的,同公众的意见毫无关系,公众只能努力去理解和接受。在科学确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威的地位后,科学家无须大费口舌地向大众争取信任和信服。任何东西,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就可以畅行无阻。这个时期,学者关心的是方法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修辞则日益同否定性的修饰词 *mere, just, only* 联系起来,纯属“花言巧语”了。漫长的“理性的独白”时代开始了。

虽然不同的声音也存在,比如维柯(Vico)对于诗性和语言作用的强调。但是,在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时代,这种声音只能淹没在科技所创造的机器的轰鸣之中。只有随着现代文明本身弊病的逐步暴露,这种声音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到19世纪末,尼采可以说是喊出了最强的声音。“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尼采,1993:106)。当然,我们知道,为了振聋发聩,尼采经常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Kelly,1998),但他无疑深刻揭示了真理与修辞的关系。

尽管有这些呼吁,但修辞学的真正复兴,还有待一个堪称天才的关键人物,一个被誉为亚里斯多德之后最伟大的修辞学家,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学家——肯尼思·博克(Kenneth Burke)。<sup>①</sup>博克的成就,主要是源于他拓展了修辞学的范围。我们知道,在亚里斯多德,修辞学主要关心的是“说服方式”,而博克则认为,修辞还有“认同”(identification)的作用。博克的理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种戏剧论(dramatism)。当然,这一观点同米德、卡西尔、戈夫曼等人的理论颇多一致之处,但是,除了强调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symbol-using animal)外,博克的贡献还在修辞学的分析上。他把修辞定义为“人类行动者(human agents)使用言词在其他人类行动者身上形成态度或者诱导行动”;或者,“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手段来使用,以诱发就其本性对符号作出反应的存在者之间的合作”。

博克将修辞的重点由说服移到认同,实际上也是将修辞学从一种有关文本的理论(a theory of text),拓展为一种有关社会行为的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而在这种拓展中,有关人类行动者的基本假设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将修辞限定在说服上,实际是注重人类行为中工具一目的的方面,追求一种直接的效果。而拈出认同这个维度,则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和深层的因素,即在符号活动中,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共同的方面。

在博克看来,人的生存状况包含了身份确认(identity)和认同之间的张力。前者是基于个体化原则(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无论我们在其他方面具有多少社会性,我们是一个一个地生与死,肉体上立刻感受某种快乐和痛苦,别人无法一模一样地体验”(博克,1998:159)。而使用符号的能力中,“潜藏着认同的材料”。“最简单的例子:沟通的能力使一个部落共享成语、诗歌、戏剧、故事和演讲等等成为可能”。一个人也许会觉得自己“属于”某个清楚或不清楚地界

<sup>①</sup> 此公从未在大学呆过一年以上,因为强烈的创作冲动让他无法按部就班地当学生。但他后来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不少学术机构任教或从事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持久与变化》(1935)、《对待历史的态度》(1937)、《动机语法学》(1945)、《动机修辞学》(1950)、《宗教修辞学》(1961)等等,主要是在40、50年代出版的,但其意义在60年代以后才得到重视。而在迈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所谓的修辞学转向之后,博克依旧魅力不减。有关情况可以参见相关网站。

定的实体,诸如家庭、种族、职业、教会、社会阶层、国家。简言之,在博克看来,“一个人对于他个人身份的确认可能涉及到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他与人类或世界的总体认同,而且也是某种凝聚,这种凝聚也暗示着一些与分别和分裂有关的规范”(博克,1998:161)。①

博克对于修辞学转向的贡献,就在于将修辞视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说服”。但对于“新修辞学”运动的形成,还有一项关键性工作尚未完成。博克只是直觉性地指出了修辞的无所不在,而要让这个观点为学术共同体所接受,还要进一步证明修辞何以如此的特性。关于修辞的认知性的揭示,则填补了这个环节。

最先明确提出修辞的认知属性的,当是司各特(Robert Scott)1967年的《论修辞的认知性》(On Viewing Rhetoric as Epistemic)一文。但是该文尚有不够缜密的地方,尤其是从人文学科出发,容易将一切问题都相对化,不能有效地涵盖自然科学中的认知性。我们觉得,什尔维兹(Richard Cherwitz)的《修辞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新修辞”的认识论声称的淡化》(1986)一文中的观点,应该是给修辞学的认知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定位(参见博克等,1998)。

修辞学一直最多被看作是一种使真理更加有效的手段,或者是“加到真理上的一种冲动”。真理是早就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修辞只是在传播真理时起一点说服作用。这是“旧修辞学”的一个基本的看法。而“新修辞学”的出现,实际上首先是关于真理本身的设定发生了改变。司各特指出,“人类必须将真理看作不是固定的、最终的,而在各种我们身处其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不断被创造的……那么在人类的事务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式:它是认知性的”(参见博克,1998:21)。任何其他世界观,“都无法给修辞提供一个合法的功能”(博克,1998:172)。而约翰斯顿(Henry Johnstone)也为新旧修辞学的转变,贡献了一个关键的思想,即发现真理和传播真理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

在新修辞学的观点看来,真理不过是共同分享的确定性或者知识(shared certainty or knowledge)。那么,这种确定性或肯定从何而来?“肯定是从对修辞交流中的执着的追求而派生出来的——修辞交流是人们在辩论(‘思想的市场’)中把大家的思想集中到一起的过程”(博克,1998:173)。尚未确立的知识源于个人选择性的经验,思想只有经过了自由的公开辩论后才会进入反思阶段,才会成为真正的修辞。辩论和交流,也就能使思想得到互为主体性的证实(intersubjective validation),从而创造真理。由此,修辞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类知识的性质、根据、局限、标准以及合法性的艺术。也因此,修辞成为与科学和辩证并列的认识方式。

在这种新的分类中,“综合”和“演绎”真理的任务属于辩证,“发现”和“寻找”真理的任务属于科学,而“唤起”真理的任务则属于修辞。辩证学家通过三段论法,依据必然逻辑的原理来论证真理;科学家通过观察,运用一致的原则来辨别真理;而修辞则依赖劝说,通过互为主体性的合法化来确定真理。尽管在这三个领域中肯定真理的方式不同,但它们之间并无高低等级的区分。

从互为主体性的角度来揭示修辞运作的本质,其实也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人的思想的碰撞和并列——来说明修辞创造真理的机制。这样一来,其实也是指出了

① 值得注意的是,博克通过拓展修辞学的范围,得出的结论同哈贝马斯通过将重心从工具理性移到沟通理性而得出的结论非常相似。在讲通过认同而凝聚的同时,博克还注意到分裂的存在,从而避免了哈贝马斯的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另外,博克所提的戏剧五因素说,其实也与哈贝马斯的四种行动理论的分类非常相似,但好像涵盖更广。或许正如吉登斯所言,哈贝马斯为了说清自己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如此大费笔墨?相较之下,博克的观点要精悍、简明而且有力得多。

修辞创造真理的限制。正如什尔维兹所言,修辞之具有认知性,必须有三个条件或者标准。首先是修辞涉及的话语行为,必须是“在一个持续辩论的环境中进行的,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思想不管是对是错都被公开地辩论”。其次,“这种辩论的参与者就影响面而言必须得到平等的控制权和动议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除非修辞成为一种个人冒险及个人完善的事业,否则就无法保证为赢得执着所作的努力会创造知识”(博克,1998:179—181)。这里所谓的冒险,就是辩论者接受这种可能性,即自己的观点会因为与他人交锋而改变。

由此,修辞的认知性和限定性都得到较为充分的昭示。而这为“探究的修辞学”的出现,或者为在人文和社科领域中广泛的“修辞学转向”铺平了道路。当然,有了以上的认识,要证明修辞的无所不在,我们完全可以从一条更为简单的思路出发。我们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科学研究中,谁也无法声称自己是发现了绝对真理。在其他生活领域中,大凡抱着对话态度的,也会接受这个前提。但是,我们又总有走到真理前面、越真理而去的冲动。无论是为了推广自己其实是暂时的结论,还是为了行动而必须假设一种确定性,甚或是为了建构意义的需要,我们往往面临让自己或别人确立和认定一种真理的情境。而显然,无论是经验还是逻辑,都不可能为此提供充分的基础和理由。于是,修辞是注定要被夹带进来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存在着未明之处,我们必须用修辞填补其中的空白。或者,简言之,“生活的不透明性使得修辞成为必要”(博克,1998:189)。而人类认识的特点是,当我们所谓的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未知的领域也越大。按照卢曼的说法则更简单了。卢曼认为,既不是必然(necessity),也非不可能(impossibility)的偶然性(contingency),是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Luhmann,1998)。但在我们作出判断和采取行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需要劝服他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必须以一定的确定性为前提,那么修辞肯定是免不了的。而且越是推崇所谓的理性,越是离不了修辞。

说修辞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说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修辞手段来推销任何观点。事实上,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为可能的修辞手段的采用设定了限制。可以采纳的修辞资源,也就是获得认可的修辞策略,总是受到共同体的约定的束缚。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大致框定了人们可以诉诸的修辞的范围。

## 探究的修辞学

“探究的修辞学”(rhetoric of inquiry)的提出,一方面固然是新修辞学运动的力量向外渗透,另一方面无疑也是想替代“探究的逻辑学”(logic of inquiry)。我们知道,恰是随着科学的伟大成就和日益成功,为了理解或者厘清科学成就的理性基础,开始了探究的逻辑的追问。但在此名义下的探索,并未找到终极的依据,得到的仅是一系列的否定性回答,从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说,到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说,一直到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怎么都行”的反规则。所以,只有在科学哲学发展的背景乃至科学社会学的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探究的修辞学”。

尽管“探究的修辞学”是在20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一场自觉的转向,但在此之前,已有许多先行者从事了探索。提出探究修辞学的人,大概也是出于修辞的目的,在追溯自己的谱系时,走得很远,甚至提出“隐含”(implicit)的探究修辞学,这样一来,就几乎把上个世纪之交以来所有真正具有突破性思想成就的学者囊括其中了,比如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罗蒂,等等。无疑,这些人确实为探究修辞学提供了理论和智识的背景,但若

如此串联的话,名单未免太长了。在此,我们只关心明确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的观点。

“探究的修辞学”的提出,是针对这种状况,即“现代学者一般都否认自己的修辞。他们戴着最先在17世纪披上的科学方法论面具,业已忘记底下的修辞面孔。他们简单地重复以官方修辞来反对修辞,目的是为了舒缓焦虑:有关事物是如何在实验或图书馆内真实发生的焦虑”。而“看穿方法论面具的一个途径是探究学者之间实际上是如何对话交流的”(尼尔逊、梅基尔、麦克洛斯基,2000:8)。显然,在这点上,即在对学术研究的真实过程的揭示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功不可没。我们知道,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于实验室里和科学论文中的科学事实的社会性建构的研究,直接宣告了所谓的科学方法或规范,其实从来没有被严格遵循过(成伯清,1992)。相反,实际的观察让人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所有科学家和学者,无论其研究领域是什么,都依赖同样的修辞手法:比喻、诉诸权威和打动本身就是由修辞创造出来的听众”(尼尔逊、梅基尔、麦克洛斯基,2000:10)。科学一向声称自己是研究事实的,但事实本身是沉默不语的,用事实来说话,一向是科学家的主张。但是,“不管事实如何,说话的是我们——无论是藉着它们还是为了它们”(尼尔逊、梅基尔、麦克洛斯基,2000:15)。

不过,探究的修辞学,尽管“将逻辑和理性从绝对的、预先存在的高空,拉回到历史和行动的创造性和脉络性的网络”(Brown,1990:189),却“并不谋求成为一门有关自身的学问或凌驾其他研究的权威”。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探究的逻辑学者,“为抽象所束缚,常常不能正面处理实际践行的问题。探究的修辞学者,决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他们不要追寻抽象和独立自主的领域”(尼尔逊、梅基尔、麦克洛斯基,2000:27—28)。也就是说,不要再在修辞学的旗帜下,重新探寻普遍的准则。实际上,这也是指出了一条不同的更加强调多元的科学游戏规则。这既是对实际的科学活动的事实尊重,又是一种维持科学之创新动力的方案。

探究的修辞学,应该看作是一场运动,而其中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拒绝在探究和鼓吹之间的传统区分。科学探究是一项共同的事业,依赖于论点和反论之间的较量 and 检测,这在库恩以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私下探索和公开鼓吹之间,个体学者的形象迥然不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个人内在的思考和认知过程或者说内部对话与公开话语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准备公开呈现的观念中,怀疑、焦虑和对对立立场的真理性的认可,往往受到压制。也就是说,在私下考虑时,可能想到各个方面,但在呈现自己的观点时,则竭力为之辩护,而掩饰其他观点的合理性(Simons,1990:4)。

西蒙斯在《修辞学转向》的导论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探究的修辞学应该是复数。也就是说,对于研究探索的修辞学分析的路径乃至目标是多元的。当然,我们知道,修辞概念本身,从历史和内涵上看,就是歧义迭出,意涵丰富。所以,将修辞视为“发明”(invention)、“论辩”(argumentation)、“比喻”(figuration)、“文体”(stylistics)、“受众和情境适应”(audience and situational adaptation),还是“谋篇或布局的艺术”(art of composition or arrangement),在进行探究的修辞学分析时就各有侧重了。此外,也可以从说服力话语的形式、模式或者文类入手,这样就有了研究报告的修辞学、学术专业的修辞学,以至各门具体学科的修辞学,比如经济学的修辞学、社会学的修辞学。在此意义上,修辞相当于一种话语策略,将多种话语融会贯通,为没有条理的话语提供一个轨道(Simons,1990:11—12)。

当然,探究的修辞学,也可以将修辞看作是纯粹的辞令,看作是花言巧语,一种愚弄别人的夸夸其谈。这时,探究的修辞学就表现为“解构”学术的装腔作势。有人将修辞看作是煽动错误意识的手段。修辞也就成了事实和逻辑之外的因素(extrafactual, extralogical factors)。甚至有

人主张,“在将修辞上离析出来的要素撇到一旁以后,并无经验的或理论的核心,并无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自身的本质性的科学”(Simons, 1990: 11)。这种修辞之外无一物的观点,显然过于极端了。多数从事探究的修辞学分析的学者还是认为,“单凭修辞……并不能取代各种科学所依赖的所有的方法、勤勉的工作、工具、原则和可以观察的现象”。即便是主张社会科学知识是通过修辞建构起来的学者,也认为“这并不是要将科学‘还原’为修辞,从而使之变为讹误和无用之物。而是说,当科学著作具有理论或者政策的关联时,修辞成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科学著作的分析,应当既包括修辞的成分,也包括经验的成分”(Simons, 1990: 10)。

所以,从事探究的修辞学的学者,并非热衷于破坏性的解构,而是在从事一种建设性的工作。比如,以对经济学的修辞分析而著称的迈克洛斯基就一再强调,“在经济学中引入修辞学并非意味着用修辞学取代细致的分析’,或偏爱污言秽语、花言巧语而放弃数学……对经济学文本进行修辞研究,是一架建设的机器,不是一架破坏的机器。它不是要在论据中引入非理性,而是恰恰相反。它要引入的是摆脱那种人为地把论据限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内的非理性做法,回归人类论争的理性。它要公开探讨经济学家们在论争中所做的一切——在暗中进行的一切,经济学家们肯定做了许多这类工作,而各种官方修辞把它们留在了黑暗之中”(迈克洛斯基, 2000: 210)。实际上,新修辞学的重建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如何切合情境和问题去进行论辩与使用语言。既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证明”(proof),那么就要努力去发现合乎情理(reasoned)的判断和比较,或者说,必须提供良好的理由(good reasons)让人信服。

总之,尽管探究的修辞学是想给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以一个终结,尽管具有反方法论(anti-methodology)的取向,但并非如“相对主义”之类的标签所暗示的那样,放弃了一切科学原则。他们所做的,是打破学术专业的樊篱,将学术话语重新置入公共空间之内,还其本来的面目。

## 社会学的修辞

社会学从其试图确定自己的学科地位开始,就基本上依据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竭力排斥文学与修辞的成分<sup>①</sup>,但同时又在使用着自己特定的所谓“科学”的修辞手法,追求“一种没有风格的风格”(a style of non-style)。当然,在社会学中,也已有若干从修辞着眼的反思和批判,不过都未能就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本身的问题来做一番检讨。但正如前面所说,探究的修辞学并不想取代旧有的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为科学探究奠定恒常的基础,或者填补由于对它们的不信任而留下的空白。探究的修辞学所倡导的,在许多方面,从具体的探索活动到探索的目标,都与以前基于方法论主张而形成的做法大不相同。

从探究的修辞学角度来重新审视社会学,还是一项有待展开的工作。下面我们仅从几个方面来稍作尝试。尽管我们所选择的几个问题可以说是随意的,但它们并非都是可以任意忽略的,也不是毫无关联的。

### 社会学的修辞之一: 常识的问题

涂尔干对于社会学科学地位的确立之功,无人能出其右;而在说服学界和大众将社会学当作一门科学来接受时,涂尔干使用的一种关键的修辞手段,就是强调科学与常识的不同。在

<sup>①</sup> 在经典社会学家中,大概只有齐美尔比较自觉地注意自己的修辞风格,也许正因如此,也一直处在社会学的边缘。参见成伯清(1999)。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序言”中，他首先就指出社会学同常识的区别，“既然存在着——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我们就应该希望这门科学不应是对传统偏见的简单复述，而应使我们以不同于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因为凡是科学，其目的都在于发现，而凡是发现，都要或多或少地动摇既有的观念。因此，除非使常识具有其他科学里早已不复享有的权威——但不知从何处获得这种权威，否则，在社会学中，学者就得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坚决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态度。如果说专爱提反论是诡辩行为，那么，当事实要求人们必须反论时而回避之，则是怯懦和不相信科学的表现”（迪尔凯姆，1999：1）。

显然，打破常识的权威才能建立社会学的科学权威，而要打破常识，就要提出同常识相反的见解。在此，涂尔干将常识与“传统偏见”划等号，并将科学与“无所畏惧”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应以毫不“怯懦”的姿态来迎接可能的“诡辩”的指控。在此不难看出，以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建立科学基础为己任的涂尔干，其实还是以常识的道德为准则，来诉诸读者之心，为自己的科学努力声张。

不仅如此，在涂尔干随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常识并未被他抛开或者推翻，反而成为其建构自己观点和结论的基础。在上述引文中，涂尔干故作蔑视地质问常识的权威从何而来，其实，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的论述中，他倒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答案。因为，他所界定的“社会事实”，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我们在发现自己的存在的同时就发现了它的存在。它不仅与我们并存，而且是一种反复实践的产物，所以通过反复和积习便具有了一种影响力和权威”（迪尔凯姆，1999：39）。无疑，常识也应是一种社会事实，比如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常识。这样，常识的权威性，不就显而易见了吗？当然，涂尔干是要将常识从科学领域中驱逐出去，但根据他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准则，即社会事实应当根据社会事实来解释，岂不意味着常识总同他的科学结论关联在一起？

涂尔干在话语中并未成功地切开科学与常识之间的纠缠，那么在其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又是如何呢？在有关自杀的研究中，涂尔干（2001）确实是给出了一个不同于常识的关于自杀的定义：“凡由受害者本人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在这个定义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自杀者本人的“意图”（intention）的缺席。而自杀意图的缺席，使这一定义包含的自杀范围比常人理解的要宽泛，比如，并不想自杀但是绝无生还机会的战争中的英雄主义行为也就在自杀之列了。忽视行为者本人的意图，在涂尔干并不是无意或疏漏之举，而是因为一方面他主张将社会事实当作“物”（thing）来看待，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接受常人关于自身行为动机的说明（account）。大概在他看来，那是属于常识的范畴，不应该在科学中受到尊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予计较。再看看被他当作论据的自杀统计数字，我们马上就能发现，他所直接采用的，不过是由常识汇集而来的官方数据，其中包含的案例全是常识所定义的自杀。而根据常识的定义，不可能包含所谓的利他性自杀。另外，由于特定的道德传统——对此，涂尔干自己也很清楚——许多自杀是不能在统计数字中体现出来的。谁愿意接受亲人自杀的事实？谁又愿意让社会知道这个事实？当然，涂尔干确是建构了一些常识无法觉察的社会事实，比如所谓的自杀“社会潮流”（social currents），但是这种明显神秘化和实体化的概念，其立足之地，还是常识。所以，一心要同常识划清界线的涂尔干，其实并未逾越常识。所以，反对常识，不过是他建立社会学科学地位的一种修辞罢了。

这种修辞手法是社会学创立之初特有的吗？恐怕不是，只不过后来的修辞更为复杂罢了。



我们先来看撰写过《社会学方法新准则》的吉登斯。在讨论吉登斯的修辞之前,还请读者注意下面这样一段插曲。加芬克尔提出了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其初衷是为了取代社会学。注意,他们的学术野心不只于增添一个新的维度,而是要取而代之。常人方法学有一个根本的观点,就是人人皆是社会学家,也就是说,常人与专业社会学家之间并无根本的分别。不过,由于常人方法学者坚决的不妥协态度,他们的观点一直未能贯彻到社会学的核心——尽管主流社会学家或明或暗地从他们那里借取了不少洞见。而从常人方法学中“挪用”(appropriate)了不少学术资源,但在立场上仍旧站在常人方法学所谓的传统社会学一边的吉登斯,可以说是主流社会学家对待常人方法学的一个典型。

吉登斯认为,人与物之不同,在于人类是操持概念(concept-bearing)的行动者,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吉登斯并没有一概否定常识,甚至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确证妇孺皆知的常识观点事实上是有效的(Giddens, 1987: 5)。更进一步,吉登斯认为“可以恰当地说,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是社会理论家,根据自身的经验改变他们的理论,而且乐于接受在这样做时可能获得的信息。社会理论绝非学术思想者的特殊而与世隔绝的领域”(Giddens, 1984: 335)。接下来的话更为关键,“不过,日常行动者一般主要关心他们在日常活动中所使用的‘知识’的实际效用,而且社会的制度组织总有一些基本特征(包括,但不仅限于,意识形态),限制或者扭曲了他们视为知识的东西”(Giddens, 198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吉登斯承认普通行动者是有知识的,但在这个知识上加上了引号。其次,他假定普通行动者的知识受到社会条件的遮蔽,而言下之意,似乎社会学家的知识具有豁免的特权,可以超脱这种遮蔽。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吉登斯其实是通过巧妙的修辞,将常识收编,承认它们的存在(这种承认大概也有迫不得已的成分,因为社会科学的所谓“发现”,对于所涉及的当事人来说,不一定是新鲜事),但同时认为其真理性要么值得怀疑,要么有待社会学家的确证。然而,社会学家的知识何以能够豁免,根据什么说社会学家不同于常人,吉登斯却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而只是诉诸惯用的修辞,同时又使出新的遮眼法。

因为吉登斯非常清楚,标榜客观主义的传统将社会科学常识对立起来时,可以保持“批判的锋芒”(critical edge)——实际上是维持一种相对于常识的说三道四的特权。<sup>①</sup>而吉登斯显然想保留“批判的意志”,于是,使出了一个新招,即在“共同知识”和“常识”之间作出区分。所谓共同知识,是指“社会分析者对信念的本真性或者以解释学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的描述,必须给予的必要尊重”。这个定义非常有意思,它更多地指的是社会分析者的一种姿态,一种立场,而不是实质的内容。他强调“必要”具有逻辑上的力量,确实没有错,因为任何科学发现都需以一定的共同知识作为前提条件,但核心的问题,即什么是共同知识,则好像被他绕过去了。不过吉氏关于常识的定义则清楚多了,即“在日常活动的行为中所包含的命题性信念”(Giddens, 1984: 337)。这样,常识就不被看作知识,而是作为可以证伪的信念的共同知识。其实,吉登斯并未区分知识与共同知识,但他确实希望将常识限定于一些命题性的信念。这等于直接定义:凡是可以被科学地证伪的是常识,而不可以的则大都属于应当尊重的公共知识。如果考虑到波普以是否可证伪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那么吉登斯岂不就等于宣布常识属于科学领域吗?这是多么奇怪而可笑的逻辑!而我们知道,许多常识恰恰是以不可证伪为自己的特征。再说,关于常识的常识定义,显然是常识包含了所谓的共同知识,而不是倒过来。或者说,常识

① 我们并不是试图消解批判的锋芒,而是指这种观点并不能维持一种有效的批判立场。参见拉图尔(Latour, 1993)。

即是特定群体成员的共同知识。总之,这个区分,除了出于修辞的需要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不惟如此,吉登斯还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这种信念,都能被持有者通过话语的方式表述出来”(Giddens, 1984: 337)。加上前面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组织制度的限制和扭曲作用,我们其实应该得出这种结论,即社会学的批判应该是揭示社会遮蔽作用的机制,以及日常行动者何以不能表达自己。毫无疑问,“我们有关自身的行动及其理由的话语——即我们能够付诸言词的东西——仅仅触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作所为的某些方面。就我们的活动而言,存在着极其复杂的非话语(non-discursive)的方面,这是社会学尤应感兴趣的地方”(Giddens, 1987: 7)。但显然,吉登斯只满足于与常人在话语上一决高低,而不想揭示常人必须由别人代为表达的原因——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批判所立足的地方。如果将社会学的职责限定在揭示各种无意识的动机(比如本体上的安全)或者对实践意识进行科学化,并不能让社会学家找到自身之超越性的依据。

这与吉登斯相信“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有关。为了论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吉登斯还有另外一个修辞策略,即所谓的“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Giddens, 1993)。根本而言,这个概念与其说是指明了社会学的一种逻辑,不如说是揭示了现代社会之反思性的一个特征。因为吉登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专家——包括社会学家——的作用和地位,所以并没有超越涂尔干关于常识与科学的观点。双重诠释中所谓的两套意义体系的区分和交织,归根结底,不过是两种修辞的碰撞和渗透,即日常修辞和学术修辞,因为“社会学观察者使用的语言,总是或多或少与普通行动者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Giddens, 1984: 337)。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社会学对待常识方式的修辞学批判中得到有益的启发的话,那么根本的一条,就是揭开作为专家的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知识的真理性声称的伪装,打破他们对于话语的垄断权。“怎么都行”,其实应该在当代语境下转化为“怎么说都行”,因为“说”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权利的表述。

## 社会学的修辞之二: 客观的旁观者还是故事的讲述者

社会学所发现的规则应该也适用于社会学者自身(Bourdieu, 1990),因为社会学者无疑也是社会中的一员。简言之,社会学是研究我们自己的。但在社会学理论的图景中,理论表述者本身,却往往作为一种旁观者或者观察者,充当了无所不知的隐身上帝,至少也是客观中立的权威讲述者(布斯, 1987)。

社会学者作为旁观者,同时也就假定了存在着一个外部的世界(out there),等待社会学者去描述、解释乃至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但是自从理论建构中的语言维度得以彰显以后,这种假设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且不论外部的世界并无自身的本质,端赖于学者的建构;而且学者也不是一种真正的价值中立的观察者,去毫无偏见地发现外部世界。从韦伯所谓的“价值关联”,我们就知道学者选择观察什么,是由先行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当然,韦伯要求在选定课题以后保持价值中立,其实也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规范性要求。其实,从探究的修辞学的角度看,没有必要作出这种根本就无法保证的承诺——因为这极有可能是自欺欺人的借口。

从探究的修辞学观点来看,学术应该是一种局部的沟通和转化的符号活动。学术是一种符号活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区别于其他活动的一个关键标志。沟通的目的是在取得共识,建立认同。当然,认同的确立,通常借助于强调与他者的区别,从而造成与他者的隔离。这也是为什么博克在讲“修辞情境”时,使用了“凝聚与分裂”的副标题(博克, 1998)的原因。转化

(translation)活动则包含了很多方面,既带有鲍曼(2000)的含义,也带有拉图尔(Latour, 1993)的含义。不过,我们在此主要关心的是转化作为一种建立联系的方式。因为学者一旦涉足一个领域,谈及一种对象,事实上也就是通过一种话语方式,将之纳入学术共同体乃至所在的更大共同体的视野——至于是否有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著述者之所以著述,肯定是为了引起注意。而对于学术活动之所以要加上“局部的”的修饰语,那是因为任何学术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脉络中,尽管不少研究作出了普遍性的声称,但这显然是一种修辞。

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待社会学的话,很多在原有框架下存在的争论,就变得非常的无谓,因为诸如此类的争论,不过是讲故事的各种策略之间的争论,是偏见与偏见的交锋,极少涉及社会生活本身。我们应当注意的倒是,社会学理论在讲述社会生活的故事时,可能发生的系统性偏差。比如,布迪厄(1992)所指出的“学者谬误”(scholastic fallacy),就是用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这种偏差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作为学者,其所关心的是给世人讲述一个干净利落、首尾一贯的故事,怎么可能充分尊重实践逻辑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呢?故事中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实践紧迫感(exigency),即应付自身生存中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对于这类问题,从来就不可能有清晰的指导原则。布迪厄试图通过不断反思来加强研究的客观性,其实仍然没有摆正研究者的位置。当然,这又同他注重“客观”的场域力量的约束的社会学假设密不可分。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更多地讲的是关于学者如何建构自己有关社会生活的理论活动的特点,而不是切实地刻画了社会生活是如何结构化的。

从修辞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我们知道,无论怎样的观察,隐蔽的还是公开的,都打破了被研究者的原有生活格局,至少增加了一个新的异己的因素。与研究对象的访谈,其实也是诱导其讲述自己生活的故事,而任何人在讲故事时,都要看听众抱有怎样的期望。大量的对于人类学现场研究的反思已经告诉我们,即便是土著居民,在同这类研究者接触多了以后,也知道怎样投其所好,编讲访问者爱听的故事(Bruner, 1986)。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学者通常并不相信当事人所讲的故事——如果不增加点什么新的东西,何以证明学者存在的必要?至少他们觉得当事人是无法了解自己的深层动机或者制约他们的无形力量的。所以,学者通常习惯于假定自己是从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和之上(outside and above),来观察和俯瞰当事人(Anderson & Sharrock, 1983)。不惟如此,学者还会参照现有的各种版本进行编辑加工,以突出自己的创新和独特。如此一来,所谓的客观性,其实就是一种修辞策略。

如果将研究者放回到修辞无所不在的现实世界,将研究者看作同一般行动者一样的需要说服别人的行动者,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幅更加贴近生活的社会人的图景。其实社会学忽视人是一贯的弊病。曾经声称要把人带回到社会学中的霍曼斯,结果给我们的不过是一幅“经济人”与“心理学之鸽”杂交的图景。现如今,更有人走向极端,开始质疑“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假设存在的必要性了(Abell, 1996)。其实,社会人的首要特征,也是体现社会性最充分的特征,即人是相互沟通着的,寻求着认同,通过说服也使相互的合作成为可能。同样,也是因为沟通扭曲的问题,使得相互的敌视加深。当然,我们并不想说修辞就是一切,但忽视这个维度,确实只能提供一种片面的社会生活或者人的图景。比如,哈贝马斯是非常看重沟通的,但他相信“日常的沟通实践,由于固有的理想化,而使学习过程成为可能”(Habermas, 1987: 205)。这种学习过程展示了一种独立的逻辑,超越了所有的局部性限制,因为体验和判断仅是

依据可以批判的有效性声称形成的。由此,哈贝马斯认为,“就其纯粹形式而言,修辞要素仅在诗意表述的自我指涉中发生,亦即仅在专门用于展露世界的虚构语言中发生。即便日常生活的正常语言根深蒂固地具有修辞性,但在不同语言功能的母体之中,修辞要素退避了”(Habermas, 1987: 209)。所以,尽管科学技术、法律和道德、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等等专门的语言,依靠隐喻性的修辞来增强说服力,但是修辞要素,虽然未被擦去,却被驯服了,以服务于解决问题的特殊目的。所以,归根结底,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逻辑高于修辞,概念高于隐喻,否则在他看来,学术的严肃性和创造性就难以维持。“任何人,倘若为了削弱自我指涉的悖论而将彻底的理性批判转置于修辞领域,必将同时使理性批判之剑本身失去锋芒”(Habermas, 1987: 310)。

所以,毫不奇怪,哈贝马斯还是站在纯粹而独立的理性角度来理解我们的世界。即便在谈到生动活泼的生活世界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经验案例,因为复杂多变的经验,其实是无法为漂亮的理论体系所容纳的。结果呢,他只能为我们提供一幅乌托邦的图景。<sup>①</sup>

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失去现实的感受力,而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以旁观者的立场,来将活生生的现实表述为抽象的命题体系,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变成了“系统”——这个概念原先就是由工程师改行的帕累托引入的,后来由偏好生物学类比的帕森斯发扬光大,成为社会学的核心范畴,而忘记了自己的隐喻出身。到了吉登斯手里,则是费力地区分社会与社会系统,却不提及学者在建构这类概念时的人为之处及其对于实践的后果。

修辞学的转向,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如何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来建构所谓的社会学——一种科学。系统,其实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后果,甚至也是现代性本身的一种特征,无论大至民族国家的建立——通过不断的卷入过程(Bourdieu, 1998),小至理论本身的总体化趋势,都与特定的控制动机联系在一起。社会学给出这样的现实图景,其实与现代科学所要垄断的专家资格和身份,从而是现实的解释和规划的权力动机,密不可分。<sup>②</sup>

典型的社会学真理,也是由概念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命题。社会学就是揭示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甚至是永恒的联系。但社会生活乃是永远处于流变之中的过程,是在时间中的动态展开,是在各种现有条件的制约下的多种可能性中的选择。要素本身,或者所谓的概念所反映的内容本身,就是变动不居的,何谈它们之间的稳定关系?而在这种过程中,沟通、磋商、斗争、说服,永远是不可或缺的。而在这些过程中,又怎能少得了修辞?

能够说明我们的实际状况的,不是超越时间的命题或者命题体系,而是带有时间性的叙事。当然,在叙事模式中,所谓的现代时间性(temporality)观念,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变。而决定一个叙事的可信性的关键维度,就是修辞。所以毫不奇怪,修辞转向和叙事转向,在目前社会理论探讨中同时发生。理论是一种“故事”,社会理论应当是“带有道德意图的叙事”(narrative of moral intent)(Seidman, 1991)。不惟如此,社会学也应直面其所研究的现实,采取一种“社会学的介入”(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Touraine 语)的行动姿态。

### 社会学修辞之三: 定量狂

使用数学的多少,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其实,在对各种现象进行数学

① 尼尔逊等人(2000)将哈贝马斯列为探究的修辞学的同盟者之一,实为不妥。

② 当然,理论本身是局部的努力,但任何一种理论似乎都有总体化的企图和趋势,而不同理论之间的多为想象性的交锋,确实有时可以解构权力的总体化机制。但一般说来,无论站在哪种角度和立场,谁都希望自己的理论有接受者,希望理论可以涵盖更多对象,因此,理论本身是总体化的。只是这种总体化,是人类发明的各种形式中成本最为低廉而且多数情况下后果最为保险的实验。当然,成为话语霸权的理论后果则是无穷巨大的。所以,理论是一种理论上影响可能最为微弱也可能最为强大的人类冒险。

描述, 或者认为数学模型能够真实地再现实际存在的时候, 要以一整套的世界观为前提(成伯清, 2001)。将科学还原为技术—方法的操作(techno-methodological operation, Husserl 语), 或者片面追求数字化的定量狂(quantophrenia), 无疑是实证主义对数学的误用。社会学家最常用的统计, 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理论(Collins, 1984), 而不单是一种追求精确的手段。对于统计手段在社会学中的普遍使用, 如果从修辞学的角度去理解, 恐怕要比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更能说明问题。

其实, 早在 1970 年, 魏吉尔特(Weigert, 1970)就著文痛斥所谓“科学的”社会学中的“不道德的修辞”。他揭露说, 从事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同仁, 尽管表面上声称他们的知识主张是建立在客观的证明方法之上, 但实际上却依赖于说服的手段。他所列举的种种欺骗性做法, 其实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比如选择性地出示证据, 来证明包含了价值偏见的命题, 并出于修辞的目的而贴上“科学理论”的标签; 掩盖实际研究过程中的真相, 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来重新编织研究的故事; 仪式般的数据收集程序, 将统计分析视为一种科学律令, 并披上“效度”和“信度”的术语外衣; 以合法的动机来掩饰真实的动机……但实际上, 往往是对非随机的抽样来进行参数统计分析, 用随意编造的问卷来进行调查, 用已被证明不可信的测量工具来进行测量, 用“表面效度”来为新的测量工具辩护, 只报告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研究结果。等等等等, 不一而足。

但是, 应该看到, 魏吉尔特所谓“不道德”的修辞, 还是指社会学者对于科学准则的破坏, 或者说, 没有很好地贯彻科学的方法论。实际上, 即便我们假定使用统计技术的研究者严格按照有关的方法论准则行事, 其实还是摆脱不了修辞。

加费尔特比较了统计量值(statistical values)和用以描述它们的词语(words)之后发现, “解释定量结果的一般做法, 是将形容词和副词加到数字之上, 从而将数字转化成有意义的结果。比如, 使用参数统计的论文, 运用诸如小、微小、大量、高和/或稳定之类的形容词来描述量值。这些形容词经常还带上副词, 以显示更大的精确性, 比如, ‘非常或高度稳定’。量值之间的关系, 则用相当吻合、本质上没有差别和极其微小的差别之类的措辞来描述”。不仅如此, 加费尔特还注意到, “相似的措辞被用于不同的数字量值, 而相似的量值又与不同的描述性措辞联在一起。一个作者认为‘相当大’的量值, 与另一个作者标为‘相对较小’的量值, 经常是相等的, 或者相差不超过 0.1”(Gephart, 1988: 60)。

所以, 即便我们不追究使用定量的前提假设, 在具体解释时也不能具有所谓的精确性。从根本上来说, 数字变成了一种修辞, 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 甚至是一种维护专家身份的策略。在竞争剧烈的学术场域, 漂亮的统计检验, 成了研究者炫耀自己精湛技艺的手段(佩雷曼, 2000)。

事实上, 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极大的异质性, 可以被数量化的程度也大不相同。一味地追求数字的精确性, 如果不是为了“利用统计来说谎”, 就是纯粹出于科学修辞的需要了。在不少情况下, 统计数字确实比经验直观, 更能让人理解真相, 但我们不能忽视在别人和自己从事数字游戏的时候, 有意无意中采用的修辞策略。

#### 社会学修辞之四: 诊断—治疗模式

社会学产生于多事之秋: 试图在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冲激之下, 重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其实, 这种秩序的梦想, 不过是一种理论乡愁(nostalgia)罢了。以“人类的良知”自居的知识分子, 总是同时自视为人类文明的医生。而社会学者, 习惯上将社会看作患上重病需要医治的对象。这种诊断—治疗的隐喻一直存在。“铁笼”、“病态”、“异化”、“失范”之类的说法, 就

假定了人类社会几乎病入膏肓。而这种诊断,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一种宏大叙事来囊括历史俯视人类社会,以自己确立的意义体系来衡量一切。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义体系,也有自己的快乐。在一定程度上,也用不着别人告诉自己生活的真相。指责别人的生活或者意识错了,或者遭到了蒙蔽,似乎一直是学者的使命。然后他们就开出处方,救万民于水火。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学者们自己往往并不能按自己开出的处方生活。公开主张和私人生活的这种不一致,往往成为笑柄(约翰逊,1999)。其实,将学术看成一种充满竞争的场所,而不必过于认真地对待学者的这种终极主张——又有谁认真对待过呢,才是比较符合实际状况的。应该承认,不同的主张提供给我们不同的观察视角,保持了社会的活力,但因此而声称真理惟我在握,就僭越而不无讽刺意义了。

诊断—治疗模式,潜在地赋予了诊断者一种话语优势地位。使用这种生病—医治的隐喻,是不可能真正尊重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这种模式暗示着诊断者具有先天的免疫能力。所以,惟他才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立场,来推销自己认为是健康的原则。

当然,从探究的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并不是要完全否认这种诊断的价值。而是指出,研究者声称自己不受所研究的病态社会的病毒侵害,其实是一种修辞手段——谁也不能说自己是超然物外的。相反,我们也不是要在科学话语中消除自己的价值立场,而是应该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社会中充满了各种苦难(social sufferings),我们尤其应当为那些深受其害而又没有机会表达自己、声张自己权利的人,运用我们的话语影响力,竭尽所能地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苦难。

## 未完成的结语

修辞学转向,不仅揭示了理论的语言构成性,表达的修辞性,更主要的是,在这种视角下,改变了科学活动本身的性质,即将之放在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而且,通过对这个方面的强调,改变了社会学中潜在的比喻和模型的意义,甚至可能改变根本的前提假设。

修辞学转向,是对客观主义(objectiv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一大反动(Gegen, 1990)。但是,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修辞,无疑也将走向另一个极端。修辞仅为一种视角,它使我们可以看出原先被遮蔽的东西,重新理解我们的许多理论假设和前提,发现科学活动中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们识别“纯属辞令”的能力;此外我们也可借助于修辞学的知识,形成更有说服力的叙述。当然,正如布迪厄所言,科学知识一向可以两种方式来加以利用,一种是“医治式”的,一种是“犬儒式”的(布尔迪厄,2000)。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能够确保科学知识只被用于积极的方面。如果说有的话,也是科学一直加以排斥的道德。

修辞学转向,或者说探究的修辞学,是一场几乎在多种学科内同时展开的运动。当然,也曾有人认为,其实并不存在社会科学的发展(development),只有社会科学的运动(movements),即各种范式的潮起潮落,交互更替(Alexander & Colomy, 1992)。但显然,诸如上述的各种转向,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反思,或者,是遭到忽视的维度的凸显,自此以后,人们不再能够那么单纯地思考问题了。

当然,正如波德里亚所观察的,当代文化是一种偏好极端(extremes)的文化,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由价值之间的辩证对立所统御的道德秩序之中,而是由价值增强(value intensification)决定一切(参见 Bogard, 1990)。在学术中也是如此。所以,以往社会理论的枯燥乏味的语言传统

渐受冷落,引人注目的是刻意简略的、宣言式的表达风格,充满了诗意的暗示,它们标志着一种根本的断裂。这种修辞手段之占据上风,无疑与当代学术竞争机制的转变,以及学术之成为消费品,都大有关系。据称堪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媲美的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尽管由于滥用新词、含混不清和充满警句式的短语,而被人视为社会理论的失败(Abell & Reyniers, 2000),但其在国际学术圈内外的成功,更应让我们注重修辞学的分析。

应该说,修辞学的分析视角,在社会学中至今仍处在边缘地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主张探究的修辞学的人,未能将自己的视角与主流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联系起来。尽管现在已经有人在开始尝试了(Burns, 1999),但总的说来,这仍是一个刚刚上路的旅程。

#### 参考文献:

- 鲍曼, 2000《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博克, 1998《修辞情景》,博克等著,《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博克等, 1998《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布斯, 1987,《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
- 布尔迪厄, 2000《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
- 成伯清, 1992《科学中的理论选择》,《社会学与现代化》第2期。
- , 1999《格奥尔格·齐美尔》,杭州大学出版社。
- , 2001,《另一种精确——齐美尔社会学方法论札记》,《社会理论论丛》,南京大学出版社。
- 迪尔凯姆, 1999《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
- , 2000《自杀论》,商务印书馆。
- 高辛勇, 1997,《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利奥塔, 1997,《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
- 迈克洛斯基, 2000《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经济科学出版社。
- 麦克洛斯基等, 2000,《社会科学的措辞》,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 尼采, 1993《哲学与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尼尔逊、梅基尔、麦克洛斯基, 2000,《学问寻绎的措辞学》,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
- 佩雷曼, 2000《经济学的终结》,经济科学出版社。
- 亚里斯多德, 1991,《修辞学》,三联书店。
- 约翰逊, 1999《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
- 周振甫, 1999《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
- Abell, Peter 1996, "Homo Sociologicus: Do We Need Him/Her?"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ology: The Classic and Beyond*, (ed.) by Stephen P. Turn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Abell, Peter & Diane Reyniers 2000,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No. 51, Issue No. 4.
- Alexander, Jeffery C. & Paul Colomy 1992, "Tradition and Competition: Preface to a Postpositivist Approach to Knowledge Cumulation." in *Metatheorizing*, (ed.) by George Ritzer, Sage Publications.
- Anderson Digby C. & Wesley W. Sharrock 1983, "Irony as a Methodological Theory." *Poetics Today*, Vol. 4: 3.
- Bogard, William 1990 "Closing Down The Social: Baudillard's Challenge to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8 No. 1.
- Bourdieu, P.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ew Myths of Our Tim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 L.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own, Richard Harvey 1990 "Rhetoric, Textuality, and the Postmodern Tur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8 No. 2.
- Bruner, E. M. 1986, "Ethnography as Narrativ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ed.) by V. Turner,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ums, T. J. 1999, "Rhetoric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ultural Constraint and Change."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Vol. 19.
- Collins Randall 1984 "Statistics Versus Word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 by R. Colli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ephart, R. 1988, *Ethnostatistics*, Newbury, CA: Sage.
- Geigen, Kenneth J. 1990, "The Checkmate of Rhetoric." in Simons(1990).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nry, Paget 1995, "Sociology: After the Linguistic and Multicultural Turns."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0 No. 4.
- Horowitz Irving Louis 1993, *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lly, Michael 1998, *Critique and Power*, The MIT Press.
-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mert, Charles 1995, *Sociology after the Crisi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Luhmann, Niklas 1998, *Observations on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ynch, Michael 2000, "Against Reflexivity as an Academic Virtue and Source of Privileged Knowled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7(3).
- Maines David R. 1993, "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a: Toward a Narrative Soci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34, Issue 1.
- Mohan, Raj P. & Graham C. Kinloch 2000, "Demystifying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ome Major Limitations and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37, No. 20.
- Peters, John D. 1990, "Rhetoric Revival, Positivism's Persistence: Social Science, Clear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ace."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8, No. 2.
- Pilkington, Andrew 1997, "Is Sociology Dead?" *Sociology Review*, Vol. 6 No. 4.
- Seidman, Steven 1991, "The End of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Postmodern Hope." *Sociological Theory*, 9:2 Fall.
- Simons Herbert W. 1990, *The Rhetoric Turn: 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igert, Andrew 1970, "The Immoral Rhetoric of Scientif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5.
- Woolgar, Steve 1988, *Science: The Very Idea*,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Limited Publishers.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罗琳